

# 汉藏石刻档案比较

——以秦朝与吐蕃为例

咸阳西藏民族学院 侯希文

**摘要** 本文通过对汉藏石刻档案记述内容、兴盛原因、保护情况的比较,拓展了我们研究石刻档案的思维空间,深化了我们对两个时期历史的认识。

**关键词** 秦朝 吐蕃 石刻档案 异同

石刻,是指刻在石材上的文字或图画。石刻文字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了石刻文字,如1935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殷代石簠,其上刻有12字。当刻写在石材上的文字具有书史记事或公务文书的性质时,我们称之为石刻档案。如春秋时秦国石鼓上的《诅楚文》就记述了秦献公为祈求天神制克楚军、复其边城的史实。具有十分明显的书史性质,是典型的石刻档案。可惜原石不存,只有刊本流传。我国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石刻档案是现存故宫博物院的战国时期秦国的石刻文字——《石鼓文》,据考证,此石为秦襄公时所刻,它记述了秦国救周伐戎有功及游猎的史实。“其字体为籀文,其文体为诗”,现尚存四百六十二字<sup>①</sup>。我们仅就秦朝与西藏吐蕃时期的石刻档案之异同作以比较,以期从这一维度阐释汉藏石刻档案的史料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 一、秦朝与吐蕃石刻档案相同之处

石刻档案在汉地获得长足发展,是在秦始皇建立统一封建政权后不久。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则是汉代以后的事,而西藏石刻档案的发展是在松赞干布统一吐蕃之时(唐朝)。虽然石刻档案在汉藏两地获得发展的时间相去甚远(秦唐相距八百多年),但就石刻档案在两地的发展、兴盛情况来看,却有许多相似之处。

1.两者石刻档案兴盛的客观条件相似。就石刻材质本身来说,石刻档案所用石材可就地取材,既容易又方便,而且便于保存,传世久远。即所谓“石在天地之间,寿非金匹也,其材巨形丰,其徙也难……舍金而刻石也欤?”<sup>②</sup>于是在秦朝建立前后,刻石成为与缣帛、简牍并行的记事手段;在西藏的吐蕃时期,为了使各部族之间盟约固定化,保存久远,不受任何人为因素或自然因素的影响,也经常采用“立碑刻石的办法”<sup>③</sup>。

就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来说,铁器的普遍使用,为石刻档案的兴盛提供了可能。我国中原地区远在春秋时代(公元前6世纪)就已经“发明了冶铸生铁的技术”<sup>④</sup>。铁器“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sup>⑤</sup>。到了战国时期,铸铁已经开始使用,并出现了钢。这就为石刻档案的兴盛创造了条件,如史载“殷周时使用铜刀乃至石刀刻石不易。春秋时已开始用铁,故刻石文字便随之增益,秦以后形成了压倒优势,看来这是铁器时代的必然结果”<sup>⑥</sup>。而西藏,远在公元前布德贡吉时期就已有铁器的制造,到了松赞干布时期,不仅兵器已广泛用铁,而且重要的生产工具都开始用铁。制铁在西藏吐蕃时期获得了长足发展<sup>⑦</sup>,为石刻档案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

2.两者石刻档案所处的社会背景相似,都是在建立统一政权之

后。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灭六国,建立秦朝以后,在全国实行郡县制,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等,并颁布了一系列统一法令,以加强封建的中央集权。为了“以示强威,服海内”,宣示统一四海的功德,他曾五次出巡郡县,刻有六大刻石:峰山刻石、泰山刻石、之罘山刻石(两处)、琅琊台刻石、碣石山刻石、会稽山刻石<sup>⑧</sup>。

松赞干布在公元七世纪初,统一吐蕃各部,定都逻些(今拉萨),建立了吐蕃王朝。创制了文字(即古藏文),设置了军政区域,并设论、尚等职官,使西藏呈现出社会安定、管理有效的新局面。石刻档案在吐蕃时期也获得很大发展。吐蕃政权也加强了与唐王朝的友好往来,且在其石刻档案中也多有反映。如在《大唐天竺使出铭》的摩崖碑刻、《唐蕃会盟碑》等均有记载。

3.两者石刻档案的史料价值和利用价值也是相似的。由于石刻档案多是“欲垂之久远,不致朽烂脱漏”,因此其原始性和真实性就毋庸置疑,从而形成其独特的史料价值。在后来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石刻档案一直起着订正其他载体文献的脱、讹、衍、误等特殊作用。秦朝与吐蕃的石刻档案也就分别成为研究秦朝和吐蕃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第一手史料。

司马迁撰写《史记》,就把石刻档案等同于“石室金匱”的密藏,并把它作为重要的史料。《琅琊台刻石》记载的“上农除末,黔首是富”,说明秦朝当时推行的是“重农抑商”的基本政策。西藏的《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记载的“大公之子孙某代或因绝嗣,其所属奴隶、地土、牲畜决不(由赞普)没收”。《工布第穆萨摩崖刻石记》载有“工布噶波小王之奴隶、地土、牧场,迨后决不减少,亦不摊派官差,不课赋税,不征馈遗”。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奴隶就像牲畜、土地一样,都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说明吐蕃当时正处在奴隶主贵族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生产者(奴隶)的奴隶制社会<sup>⑨</sup>。

石刻档案独特的史料价值还在于为研究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证。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石刻档案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雏形——秦朝形成的政治背景、经济条件以及有秦一代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生活等,也便于我们理解整个中国历史演进的轨迹。西藏吐蕃时期石刻档案则真实地记载了吐蕃政权的形成、发展及其与唐朝亲密的政治关系、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

## 二、秦朝与吐蕃石刻档案之差异

汉地秦朝的石刻档案与西藏吐蕃时期的石刻档案虽然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是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社会背景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两者在诸多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异。

1.两者石刻档案的内容差异较大。秦朝石刻档案的内容以记功刻石为主,就是铭功载德,树碑立传以留后世。

颂扬统一的强大和皇权至高无上的记载如《琅琊台刻石》:“……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碣石山刻石》:“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sup>[1]</sup>

发布政策的记载如《泰山刻石》:“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祇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会稽山刻石》:“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治。”<sup>[2]</sup>

除秦始皇本人的刻石外,还有臣下的重要刻石奏章。因此有史学家认为:“秦代大量使用刻石是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贡献,一大创造。”<sup>[3]</sup>

与汉地秦朝的石刻档案不同,西藏吐蕃石刻档案的内容多涉及盟誓、纪功、颂赏、封赠、祭祀等。

盟誓碑,如《唐蕃会盟碑》:“甥舅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今社稷叶同如一,为此大和。然甥舅相好之义,善信每须通传,彼此驿骑一任常相往来,依循旧路,蕃汉并于将军谷交马,其绥戎柵已东,大唐祇应;清水县以西,大蕃供应,须合舅甥亲近之礼,使其两界烟尘不扬,罔闻寇盗之名,复无惊恐之患,封人撤备,乡土俱安,如斯乐业之恩,垂诸万代,称美之声,遍于日月所照矣。”<sup>[4]</sup>

纪功碑,如《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对君上所委重任皆力行唯谨,勤于内政外务,惜财节库,功勋昭著。对大官小民一律相待,处以公允。对吐蕃黔首政务多有裨益建树。”《谐拉康碑》:“倡有益之议,纷乱消泯,奠定一切善业之基石,于社稷诸事有莫大之功业。”及至在予之驾前,常为社稷献策擘划,忠诚士如一,上下臣工奉为楷模栋梁,各方宁谧安乐。及任平章政事之社稷大论,一切所为,无论久暂,对众人皆大有裨益……”<sup>[5]</sup>

记载颂赏的如《工布第穆萨摩崖石刻》,记载封赠的如《桑耶寺兴佛证盟碑》,记载祭祀的如《赤德松赞赞普墓碑》等等<sup>[6]</sup>。

吐蕃与秦朝石刻档案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应该与藏民族的历史渊源有关。在藏族历史上,吐蕃各族、各部首领之间的议事常采用会盟制度。到松赞干布时期增加了重要的内容,即君臣共同宣誓:臣属必须明确表示子孙后代效忠赞普,决不生异心。赞普也表示要保护臣属及其后代的地位和财富,任何人不得侵犯。加之吐蕃与唐的关系日益密切,那么在汉地一直流传下来的石刻则被智慧的藏族人民结合自己的民族特色,形成了类似先秦“诅楚文”的石刻档案,如:先有全汉文的石刻档案《大唐天竺使出铭》(约刻于公元658年),后有四面均有文字的刻于公元823年的《唐蕃会盟碑》。这既是藏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又是汉藏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而且为13世纪西藏地方纳入全国统一政权管辖奠定了基础。

2.两者石刻档案兴盛的客观原因亦有不同之处。秦朝建立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后,需要一种能夸扬威势、颂扬功德的传世材料,如近代金石学家张衡所论“自周室衰微,诸侯强大,名器浸轻,功利是

重。于是以文字为夸张之具,而石刻之文兴矣”。可见石刻档案的兴盛正好满足了封建地主阶级“轻名器,重功利”的需要。同时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要求书写材料的变革,秦始皇奉行的法家主张,实行的明法制度,对书写材料的公布性提出了较高要求,而金鼎、简牍均不具备这一条件,从而使石刻档案得以迅速发展。

西藏吐蕃石刻档案的发展,与西藏独特的高原气候有密切的关系,在高原气候条件下,相对于其他的记事材料(纸质、木质、叶质、骨质等)来说,石刻具有较好的先天优势:材质坚硬,对温湿度变化的耐受能力强,耐磨,取材容易、方便,保存成本低,传世久远等。同时吐蕃石刻档案的发展,应该与唐代石刻档案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如西藏的《工布第穆萨摩崖刻石》,刻于公元798年到815年之间,而《摩崖刻石》在汉地存在的时间下限为宋朝,二者存在的时间基本一致。又如赤德松赞墓的“封土正面有一对蹲伏式石狮……与同期汉地唐陵石刻风格有明显联系。墓冢前有两尊墓碑,均由碑帽、碑身、碑座三部分构成:一尊是赤松德赞记功德碑,位于陵区的东北角,风格似唐碑,通高5余米,顶有类庑殿式碑帽,碑身与碑帽的底部,雕刻有飞天、云龙、日月、莲花等图案,碑身阴刻藏文题记,记载了赤松德赞一生的重要功绩……”<sup>[7]</sup>

3.两者对石刻档案的保护程度差异较大。秦朝石刻档案因年代久远、风雨侵蚀、人为损毁等,受损程度十分严重。曾载入《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秦之六大刻石,在历经多次社会变迁和战乱之后,除《琅琊台刻石》外,多已不复存在。之罘山、碣石山二刻,久不见传,峰山、会稽二刻,只是后人重摹,泰山刻石早已毁于火灾。如果没有《史记·秦始皇本纪》,后人是无法知晓秦始皇刻石内容的,研究秦朝历史就少了至为珍贵的原始文献。

但吐蕃石刻档案却保存较好。其因有三:一是由于西藏特殊的气候环境。高原气温常年较低、日温差大、年温差小的特点,有利于石刻的保护。高原的相对湿度普遍较低,即相对干燥,适于石刻的保护。二是西藏地处特殊的地理环境,人为损坏较小。西藏地处青藏高原,交通不便,人口流动缓慢,虽历经多次社会变迁,但对西藏石刻档案的损坏程度较小。三是西藏浓厚的宗教习俗,使西藏当地人民对这些历史刻石怀有相当程度的敬畏膜拜心理,从而主动以各种方式保护它们,使之免受损坏。

综上所述,秦与吐蕃时期的石刻档案,具有突出的可比性;两者分别在汉藏民族文化中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通过对两者异同的比较,可以拓展我们研究石刻档案的思维空间,深化我们对秦王朝和吐蕃政权的进一步认识,整合汉藏民族历史文化珍贵资源,为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西藏和汉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与发展提供新的视窗。

参考文献:

- [1]朱剑心.金石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205,209.
  - [2]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264.
  - [3]王尧.吐蕃金石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5,7,116.
  - [4]刘泽华,等.中国古代史(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0.
  -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9.
  - [6]郭沫若.奴隶制时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3:264.
  - [7]黄奋生.藏族史略[M].吴均,校订.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64.
  - [8]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1)[C].中华书局,1959:252,262,243.
  - [9]范文澜.中国通史(2)[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5.
  - [10]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C].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57-58.
  - [11]顾祖成.吐蕃简牍石刻钟铭档案综述[J].西藏研究,1993(3).
  - [12]中国西藏基本情况介绍.中国西藏信息中心.www.tibetinfo.com.
- 作者:硕士,副教授.邮箱:jk-hxw@163.com (责编:杨宗鸣 zy)